

人 类 起 源 地 新 论

刘 华 才

人类起源问题,长期为学术界所关注。在普遍接受从猿到人“一元发生论”的前提下,人类的起源地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本文将依据中国云南禄丰古猿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结合地质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提出人类起源地应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即人科的起源地和人属的起源地。进而推论,能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起源于单祖单中心,能制造石器的人属成员起源于单祖多中心。

一、关于人类起源地讨论的简要回顾

依据人类起源单祖论学说,现代人类只有一种共同的猿类祖先。那么,哪一种古猿是人类的祖先?这种古猿为什么会演变成人类?在何时何地演变为人类?……从“人猿同祖论”确立至今,争论从未平息。考古发现,远古大猿化石只见于欧洲、亚洲和非洲。这就决定了只能在上述地区寻找人类的起源地。

欧洲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摇篮。因为,欧洲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祥地,在那里首先发现了古代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欧洲的人类化石年代与人类起源的时间相差甚远。而且,欧洲的旧石器文化面貌与非洲大陆的石器文化一脉相承,表明是从非洲辐射发展形成的。因此,本世纪以来,争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到“非洲说”和“亚洲说”。

人类起源地“非洲说”,首推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他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1871年)一书中,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南方古猿的大量出土,尤其是东非发现更新世初期的人属化石与石器文化,使“非洲说”盛行一时。但是,非洲大陆缺乏距今800万年至400万年之间的人类祖先特征的化石,而这一类化石在中国云南已露端倪。此外,在中国、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更新世初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这些考古资料都是“非洲说”难以解释和回避的。

人类起源地“亚洲说”也是由来已久。影响较大的是德国著名进化论者海克尔。他在《自然创造史》(1868)中,推论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受其影响,荷兰军医杜布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首次发现了猿人化石。北京猿人化石出土后,国内外很多学者盛赞“亚洲说”。但是,面对着非洲大陆已发现的众多而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器,“亚洲说”却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对于人类起源这个深奥的学术之谜,我们认为,在现有的科技手段和认识能力下,综观亚洲和非洲大陆出土的化石资料,应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着重在人类起源发展进程的阶段问题上寻找突破口,从而得到近乎实际的答案。

二、人类的起源应包括人科和人属两个阶段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人类已脱离了动物界。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类又属于动物界。在生物分类中，人科作为灵长目的一个分枝。它起源于猿科。那么，什么是人科呢？学术界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广义的人科成员应包括化石人类和现代人类。化石人类又包括早期人科和化石人属。早期人科成员是由古猿转变成人类的最早代表，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能确定为人科成员的化石，必须具备以下最主要的特征：（1）直立行走是人科成员对自然界的一种最基本的机能适应。直立行走方式表现在头骨化石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枕骨大孔位于颅底部中央，该位置所反映的直立姿势，成为人科化石有别于猿科化石的独特标志。（2）蠕虫型的牙齿构造，是人科成员对自然界的另一种生存适应。该结构能使牙齿前后左右移动，进行强有力的回旋，以适应对多种食物的研磨需要。这种咀嚼方式有别于猿科的张合型。在颌骨化石上具体表现为：门齿较小、犬齿退化，牙齿排列整齐，无齿隙，颌骨缩短、齿列呈抛物线型。（3）经常地使用天然工具，是人科成员弥补犬齿退化、抵御侵害、获取食物的谋生手段。这种行为方式有别于猿类偶尔地使用天然工具。当然，早期人科成员使用的天然工具很难保留（如棍棒）和确认（如石块）。但犬齿的退化和直立行走的方式，本身就是经常使用工具的结果和佐证。此外，直立姿态和两足行走的行为方式，还带来了一系列的体质结构变化。在此暂不一一列举。

目前所知，在东非已发现距今36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它们已具备了蠕虫型的牙齿构造和直立行走的体质特征。尤其是在坦桑尼亚发现的人科脚印遗痕^①，毫无疑问地表明，它们是迈着矫健的步履，两足直立行走在东非高原上的。然而，在化石地层中却始终找不到哪怕是粗糙的打制石器。再者，已被确认列入人科的南方古猿属化石群（360万—100万年），其中几个分枝虽能够直立行走，但不会制造石器。

什么是人属呢？作为人科进化发展的主干，人属成员代表着已经完全形成的人类。它不仅是在体格上更接近于现代人类，更重要的是能够制造石器，这是人属有别于其他人科成员的根本标志。打制石器作为人属类型的一种文化特征，是早期人科成员长期使用天然石块的经验积累，同样又是人类智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晶和产物。石器作为人类最早的生产工具，它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尺，是真正的人类诞生和发展的指示器。迄今所知，在亚洲和非洲都发现了更新世初期的打制石器，最早的距今大约200多万年。

考古资料证实，人科和人属化石在出现的年代上存在着差距。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因为，从猿到人的转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演变过程。从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从起源、发展到完善，有一个转化过渡的阶段。事实上，在这个转变过程的阶段中，明显地存在着两次飞跃（或叫突变）。首先是直立行走的确立，并随之出现的一系列体质特征和构造的转变；而后才是以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一系列文化特征的出现。直立行走作为人科与猿科相辑别的独特行为方式，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科的诞生。打制石器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和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人属的诞生。由于人科成员虽已具备了早期人类的体质容貌，但还十分原始，还不会制造生产工具——打制石器。因此，可视为“正在形成中”的人类。它的进化和发展，同时受到生物进化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双重规律作用及矛盾运动，促进了人科向人属的演化。而人属作为“完全形成的人类”，理所当然地是由“形成之中的人类”发展而来的。考古已发现，能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至少在360万年前已出现；能制造石器的人属成员至少在200多万年前已出现。随着考古新发现，二者诞生的时间都还会提早，但

二者都将会始终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的出现,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既然我们承认了人类是由古猿演变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转化演进过程:古猿→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逻辑推理,还是从行为发生过程来看,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经常使用工具和初步确立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诞生在前;能够制造石器和完全地直立行走的人属成员诞生在后。倘若上述关于人类起源过程两个阶段的推论无误的话,那么,人类起源地也就理应包括人科的起源地和人属的起源地。

三、人科的起源地在中国云南及亚洲南部

依据一元论学说,人类起源于单祖。单祖者,系指直接演变为人科的那一种古猿。从生物种群系统进化论的理论看,这种古猿分布的中心地区,理应就是人科的起源地。所以,必须首先在化石中寻找哪种古猿最接近人类。已出土的化石资料表明:在中新世,森林古猿类已遍布亚洲、非洲和欧洲。绝对年代大约距今1400~800万年之间。其中,腊玛古猿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科。随着新的资料研究,腊玛古猿作为西瓦古猿属的同类雌性,已列为猿科^②。而西瓦古猿被视为可能是现代猩猩的祖先。只有中国禄丰出土的古猿化石,无论是地质时代,还是化石特征,都比西瓦古猿表现出更多的进步性质。据此,吴汝康先生确认:禄丰古猿标本与西瓦古猿标本存在着属一级的差别。因此,被命名为禄丰古猿属同名种^③,并认为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这一结论使我们深信:禄丰古猿是已知最为接近人类的古猿。它们分布的地区可能就是人科成员的起源地。其理由如下:

首先,禄丰古猿作为猿科的一个新属,它的诸多特征表现出“亦人亦猿”现象,如直接反映出能否直立行走的枕骨大孔,在禄丰古猿头骨上,其位置比猿科其他成员的偏前移,但比人科成员的偏后,因而使整个头骨重心偏向前倾^④,处于猿科和人科的中间过渡状态。再从禄丰古猿牙齿构造来看,还不是人科的“蠕动型”构造,具体形态显示出猿类的“张合型”结构。但是,它又具有较多的进步性质,如犬齿明显缩小,齿弓缩短,齿列后部张开,形状介于猿类“U”形和人类的抛物线形之间。此外,禄丰古猿头骨和牙齿,具有较多的接近非洲人科化石的一些特征。这些进步特征,意味着禄丰古猿已处于人科诞生的前夜。它们的发现与研究,为人科成员起源地在亚洲的推论,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的化石证据。

其二,距今约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在种群数量上是十分可观的。据已公布的资料,仅在云南禄丰石灰坝这一个化石地点,已出土了5具头骨化石、40多个颌骨和1000多枚牙齿化石^⑤。在同一个地点和不大的范围之内,就发现如此众多的古猿化石,足以证明该种群的庞大。可以推想,禄丰古猿在当时云南盆地以及南部亚洲,处在何等显赫的“霸主”地位。动物生态学研究告诉我们,动物群体数量多寡与该种群生命力及繁殖率呈正比。换言之,动物种群数量多,反映该种群生命力强。与其他猿类相比,这一现象本身就显示出禄丰古猿是同类进化中的成功者。如此强大而又具有进步性质的猿群,在生态环境变化之后,为向人科方向转变,提供了坚实可信的先决条件。

其三,禄丰古猿在云南地区承前启后,后继有人。在云南开远小龙潭先后发现了古猿牙齿和上颌骨化石,其特征与禄丰古猿化石有一定的相似性,表明二者同源。但开远古猿的地质时代比禄丰古猿早,化石特征也更原始一些,说明开远古猿可能是西瓦古猿类,也可能就是禄丰古猿的直系祖先。

在云南元谋蝴蝶梁子出土的人猿超科化石,地质时代为上新世晚期,距今约400万年。³

件颌骨和200多枚牙齿的诸多特征，与禄丰古猿相似，而且与化石生出的“无法用地质因素解释的花冈岩块”^⑥，使我们很自然地将这些“石块”与早期人科成员经常使用工具联系起来。

在云南元谋竹棚上新——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人属化石与三趾马动物群共出，绝对年代据推测至少在250万年以上^⑦。

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化石，地层堆积经古地磁测定，大约距今170万年。哺乳动物化石群代表的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后来有人推测可能达不到70万年。对此，有些地质学和考古学者又进行了比较研究，再次证实，哺乳动物化石和地质堆积与测试年代吻合，原结论无误。

上述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中国云南一带，早在中新世到更新世，一直有古猿和化石人类在此生殖繁衍。所以，毫无疑问地说，这里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其四，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使人科成员率先起源于南亚成为事实，这是人科起源地在亚洲的最强有力的地质证据。

从生物进化角度讲，我们在承认禄丰古猿具有系统渐变现象(亦人亦猿)的前提下，还必须注意到，新种属的出现，会存在着质变或飞跃。生物发展史证实，这种质的突变，往往是与自然界提供的“机遇”紧密相连的。如古生代的加里东造山运动，导致了总鳍鱼上陆后演变为两栖类。中生代晚期地球的灾难性变化，使恐龙家族很快绝灭，为哺乳动物的大发展提供了机会。当然，人类的诞生，尽管不是地球灾变的原因，但与自然界提供的外部压力条件是密不可分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讲，从猿到人的转化，不是在森林茂盛、果浆殷实的伊甸乐园里进行的，而是在比较恶劣的生态环境中演变的。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地质构造运动。

依照板块理论学说，地球的表层是由六大地壳块体组成的。受地壳运动规律控制，板块每年移动的速度大约为几厘米。一般来说，板块内部是相对稳定的，而板块之间为活动区。其中，新生代以来，印度洋板块与亚洲板块之间的接触带活动最为强烈。地史研究表明，印度洋板块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使两块接缝处逐渐隆起，并导致了周围地区大面积上升。4000万年以前的喜马拉雅山区还是大洋，约到新世后期被抬升出海面，大约到中新世以后，印度洋板块直接与亚洲古陆相撞，产生了剧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到上新世形成山系，至今运动从未停止。据估计，近一百年来，印度大陆向喜马拉雅山区移动的速度约为1—2厘米/年^⑧。又据法国《费加罗报》最近报道，据“斯波特号”地球卫星观测，现在的青藏高原在继续抬升的同时，每年以好几厘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这种令人惊异而又不容怀疑的构造运动，使喜马拉雅山成为世界之最。

构造运动首先带来的是地形的变化。巨大的山系、横断山脉和高原地区的形成，改变了原有的地貌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气候和环境的变迁。与此同时，气候环境的变迁又直接影响着生物界的演化和发展。

中国云南地区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云贵高原的主体。直到晚中新世以前，这里还是热带森林景观。在云南开远小龙潭和禄丰石灰坝褐煤层中埋藏的大量古猿化石，就足以证明。此后，因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随着地壳逐渐隆起，该地区气候由湿热向温暖的发展趋势发展，大批热带森林及生物群落绝灭或南迁，代之而兴起的是热带—亚热带的疏林草甸景观，这已在禄丰石灰坝上部地层中得以证实。地形、气候和植被等生态环境的变化，最终带来动物界的迁移或演化。这种生态链锁反应，迫使禄丰古猿在逐步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渐渐地改造了体质结构，继而向人的方向转化。

事实上，中新世时期的古猿已遍布亚洲、非洲和欧洲。只要哪个地区能够提供自然环境

骤变的机遇,哪种古猿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能顺应自然,接受其挑战,那么,它们就能够率先在那个地区向人类方向转化。综合考察表明,从中新世到上新世,只有在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及东南部地区,才具有这种机遇。因为这里受造山运动影响最为剧烈,自然环境变化的幅度最大。当然,整个变化过程是逐渐进行的。印度板块逐渐向北挤压,喜马拉雅山区逐渐上升,地形及生态环境逐渐改变。这种逐渐变化的过程与禄丰古猿化石的渐变进化特征十分吻合。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从猿到人的转化,是内部因素(古猿体质)和外部条件(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提供了转化的机遇,生态环境变化提供了转化的条件,加之禄丰古猿种群自身的进步性质,这一切都使我们确信,禄丰古猿就是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进行曲,顽强而逐渐地向人科方向转化。

然而,非洲大陆却不一样。在中新世的非洲,同样生活着古猿类,但它们没有遇上南部亚洲那种强烈的生态环境变迁。尽管受到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非洲板块内部也有较强烈的构造运动。如东非大裂谷逐渐拉宽,裂谷边沿有火山活动、东非高原隆起等。但是这些构造运动却始终未能改变非洲大陆的热带气候及生态景观。尤其是在从猿向人转化的那个时期,非洲上新世的气候是相对稳定的。在这种稳定的热带气候条件中,很适合古猿的生繁殖衍,而没有给古猿提供向人科转化的外界刺激条件。所以,非洲缺乏人科起源的自然条件,这又从反面证实和支持了人科起源在亚洲的推论。

四、人属由一种人科成员在亚洲和非洲同时诞生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促使了人科成员的诞生。同样由于地质现象继续带来的环境变化,使这一地区人科成员在向人属演化的同时,向其他地区辐射。这是因为,早期人类特别强烈地依赖于自然环境。地质作用与地形变化、气候和环境的变迁,动植物群落的兴衰,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早期人类的迁移和发展。在人科诞生的上新世,全球大部分地区 and 时间内,气候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亚洲却因受到造山运动的影响,气候和环境变化则是剧烈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升起,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气温和风流等,导致了周围地区的气候和生态变化发展不平衡。如青藏高原变成了独特的高原气候及生态景观。以此往北,都不适合人科成员的生存。而青藏高原东南端的云贵高原,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地段,因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等因素所形成的小气候,则很适合从猿到人的演化和发展。尤其是云南地区,地形复杂,山间盆地众多,自上新世以来,一直为热带—亚热带气候,气温季节变化不大。这种比较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人类祖先和化石人类聚集于此。在云南已发现中新世的古猿化石、上新世的人猿超科化石、更新世初期的人属化石和打制石器,足以证实这里就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中心之一。

人科诞生以后,随着气候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变,加之上新世晚期全球性气温下降,促使了动植物群落的绝灭和南迁。在这种前提下,人科成员必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随时在生活习惯、活动范围、生存方式及体质结构等方面做出新的调整。这就加速了人科成员在演化的同时,随动植物群向低纬地区迁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科群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非洲。

本来,亚洲和非洲的动物群早有交往和迁移。据李传夔先生对中新世动物群的初略统计和研究,“亚非两洲中新世确是存在着属和相近于属一级的不少相同种类”^⑨。又据吴汝康先生的研究结果,他认为禄丰古猿可能是人科和现代非洲大猿的共同祖先。这就意味着,现代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祖先也是从亚洲迁入的。上新世大量动物群体自北向南迁移,其主要原因

是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气温下降。而非洲地处低纬和赤道,甚至连上新世晚期的全球性气温下降,在这里都表明不明显,更新世出现的冰期间冰期气候,在非洲也仅仅表现为干湿交替现象,始终保持热带气候及生态景观。所以,确切地说,非洲的热带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的动物群迁入。人科成员就是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追随着动植物群体南迁,逐渐地进入非洲。

考古资料说明,上新世人科成员的适应辐射可能是多向的。中国云南地区的小气候,使部分人科成员继续在此生存繁衍,并转变为人属。部分人科成员则可能沿着云贵高原经四川盆地,进入三峡高地和秦岭地区,向东辐射到华北平原。地质资料表明,直到上新世晚期,上述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湿热,有利于人科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已在四川、湖北、陕西、山西和河北等地都发现过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部分人科成员可能沿着云贵高原的南端进入到东南亚地区。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曾发现过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云南、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人科成员,可能沿着西亚高地的疏林草甸地带,进入两河流域,再沿着地中海东岸,经苏伊士地峡到达非洲。

上新世的苏伊士地峡,是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唯一接壤地带,是亚欧动物群进入到非洲的必经通道。早期人科成员可能就是由此到达非洲、进入尼罗河流域。尼罗河东岸和红海西岸之间的高地,是人科进入东非高原的走廊。在东非,从红海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到莫桑比克,有一条长达4000公里的断裂峡谷地带,为人科在非洲的迁移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非高原,地处赤道和低纬地带,位临印度洋,气温湿热,雨量充沛,植被繁茂,尤其是森林和草原非常发育。加上断裂地带分布着很多湖泊,如图卡纳湖、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等,在这些湖泊的周围,水草丰厚,果浆殷实,鱼兽繁多,为早期人类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这便是人科成员从亚洲迁入后,越来越多地聚集于东非高原的主要因素。

从东非高原出土化石看,肯尼亚古猿距今1400~1200万年前,此后存在着化石缺环,尤其是距今800~400万年之间的人科化石,几乎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与非洲在上新世没有提供古猿向人科转化的外因条件有关。然而,距今360万年以后的人科成员却大量涌现,化石数量骤增,如南方古猿阿法种、纤细种、粗壮种、鲍氏种等等。这种分枝繁多,数量突增的现象,笔者认为,它即是早期人科成员多头发展的化石反映,正好又是人科成员先后从亚洲迁入聚集的最好证据,同时还说明人科成员可能在上新世晚期(约400万年前)已陆续到达非洲。据考证,非洲出土的人科化石与中国禄丰古猿化石具有非常相近的一些特征。如禄丰古猿与南方古猿粗壮种具有一些相近的特征,而雌性禄丰古猿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纤细种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只是禄丰古猿化石表现出较多的原始特征或可塑性,东非人科化石则表现出更多的进步性质,表明二者具有承袭发展关系。由此推测,禄丰古猿很可能就是东非人科成员的猿型祖先。

如上所述,人科成员在中国云南或南部亚洲诞生以后,呈多向辐射发展的趋势,并可能在多个地区同时向人属方向演化。从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虽不能归真反璞,但亦可管中窥豹。

在非洲,已出土很多更新世早期的人属化石和石器。较著名的有:肯尼亚的“1470号人”和“KBS工业”、坦桑尼亚的“能人”和“奥杜韦文化”^⑩。“1470号人”的生存时代尚有争议,一种测试数据认为距今约260~240万年前;另一种测试数据则认为距今约160万年前。能人的生存时代据测试最早距今180万年前。在奥杜韦峡谷发现了丰富的打制石器与能人化石共出。据报道,在埃塞俄比亚也曾发现距今约200万年前的石制品。从非洲出土的资料看,200万年前的

人属化石与石器几乎全部分布于东非高原，到能人和奥杜韦文化出现以后，人属向外辐射，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并向欧洲迁涉。

在亚洲，更新世早期的人属化石和石器文化主要发现于中国。云南元谋猿人化石和石器经测试约距今170万年，地层堆积和哺乳动物化石群所代表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云南元谋“东方人”属化石(约250万年)尚有争议，但在同一地区发现大量的上新世晚期(400~300万年)的人猿超科化石，预示着在云南寻找到300~200万年的人属化石是完全可能的。在四川巫山县大庙龙骨坡同层发现了巨猿化石和人属化石^⑪，依据动物群化石推测，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200万年。在山西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粗糙石器和古老的动物群化石^⑫，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超过180万年。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层的下部，发现在几处遗址中，打制石器与小型三趾马化石共出^⑬。这种小型三趾马曾被认为是上新世的标准动物化石，可见其时代古老。由于中国有关地层的绝对年代测试数据，需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随着新的科技测试手段的应用，尤其是对以上几处遗址进行测试以后，深信它们的绝对年代可能还会提得更早。

在东南亚，自爪哇猿人出土以后，古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岛莫佐克托和桑吉兰等地，又寻找到更早的猿人化石。其中，“猿人·粗壮种”被认为与非洲南猿相似。这是亚洲分布最南的人类化石地点。

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曾发现过丰富的人猿超科化石。在拉瓦尔品第和印度河上流等地区发现的砾石砍砸器，也反映出古老的文化特征。

迄今所知，更新世早期(或者说距今180万年以前)的人属化石和石器，仅见于亚洲和非洲。在亚非两大陆同样发现了早期的人属化石和石器文化，地区相距遥远，分布又如此之广，仅用人属起源于一个中心后再向外辐射的假说，是难以解释的。依据禄丰古猿化石和早期人属化石出土情况，只能得出这样的推论：人科成员在中国云南和亚洲南部诞生以后，至上新世晚期辐射到整个亚洲南部、西部和非洲东部，由一种人科成员在亚洲、非洲两个以上的中心，同时向人属方向演化。

五、结 论

从人类起源理论来讲，人是由古代人猿演变而来的。人作为动物界的最高种属，在体格上还保留着生物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特征。这种有机体发展的继承性，支持着人猿同祖论。当然，作为人类，她又必须存在着有别于猿类的独有体质特征。直立行走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最基本适应和特有的行为方式，是人科成员诞生的标志。打制石器作为人类最早的生产工具，这一文化现象是人属有别于其他人科成员的独特功能，是人属成员诞生的具体标志。考古资料证实，直立行走方式基本确定很长时期以后，才出现打制石器。由此可见，从猿到人，有两个飞跃，亦即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诞生在前，能够制造石器的人属成员诞生在后。依据其他学科知识和化石材料推论，人科起源于单祖单中心，人属起源于单祖多中心。

从人类起源与地质作用的关系来讲，地史资料表明，大的地质构造运动都曾促进了生物的进化和发展。人类的诞生，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生物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后演变成人类，从此角度讲，人类的诞生是必然的。但是，人类在何时何地诞生，却又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从猿类脱胎出来，不会发生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只能是在古猿分布的环境异常的地区内转化。考察中新—上新世的地质构造运动、

只有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最大。这种区域环境异常所带来的生态链锁反应,迫使着禄丰古猿逐渐向人科转化。同样还是由于环境变化,又使人科成员向热带——亚热带地区辐射,并在多个地区向人属转化。

综上所述,依据地史资料、考古发现和生物系统进化理论,通过综合研究考察使我们确信:人科成员在上新世起源于禄丰古猿分布的中国云南和亚洲南部地区;人属成员在更新世初期起源于人科分布的中国、亚洲南部和非洲东部。

注释:①玛丽·利基:《360万年前的人类脚印》,载美国《地理杂志》1979年4月号。

②吴汝康:《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关系》,载《人类学学报》2卷(1983)第1期。

③⑤ 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载《人类学学报》6卷(1987)第4期。

④ 陆庆五等:《禄丰古猿雌性头像的复原》,载《人类学学报》7卷(1988)第1期。

⑥ 张兴永等:《云南元谋腊玛古猿属一新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第3期。

⑦ 张兴永等:《云南元谋发现人属一新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第3期。

⑧ 参见成都地院《动力地质学原理》“地壳运动的速度”,地质出版社1978年版。

⑨ 李传夔:《江苏泗洪中新世长臂猿类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1978)第3期。

⑩ 吴汝康:《坦桑尼亚肯亚古人类概要》,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路易斯·利基:《奥杜韦峡谷人属一新种》,载《Nature》202卷(1964)P. 7—9。

⑪ 黄万波:《三峡高地觅踪》,载《化石》1988年1—4期。

⑫ 贾兰坡等:《西侯度》,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⑬ 汤英俊等:《河北阳原蔚县几个早更新哺乳动物化石及旧石器地点》,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卷(1981)第3期。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

(上接124页)

中国图书馆学家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是世所瞩目的。即使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险峻的岁月里,学人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也没有放弃复兴中国图书馆学的努力。在1975年《图书馆工作》试刊号上发表的刘国钧先生题为《“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的文章中,跳荡着一位年逾古稀的图书馆学家急欲突破“四人帮”专制文化封锁的激情和渴望中国图书馆事业腾飞的强烈愿望。它象一束夺目的强光灿然眩目,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的夜空。这是老一代学人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翌年10月,长风吹去了翳星的云。面对中国图书馆学又一次被历史无情抛在西方后头的严峻事实,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学者们作出了冲出徘徊的种种努力:坚决摆脱“左”的思想的羁绊,冷静地重新审视和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所提供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在面向世界中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他们在各种思潮的撞击中选择自己的新见解,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中国图书馆学家以其特有的民族素质和长期积累的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在对国外图书馆学新思想的借鉴和吸取中,提出了自己独特新颖的观点。中国图书馆学家仿效西方、承袭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主要基点的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陈迹,他们以充满自信的声音,宣告了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崛起。

注释:

①② 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所列各年度之“图书馆学论著”累加所得。

③ 南京图书馆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49.10—1980.12)收录1949—1966年之论文数。

(本文责任编辑 何天齐)